

赏邮叙情话奥运——品鉴中国邮票上的奥运情缘



《第三十三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纪念邮票。

第三十三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正在法国巴黎举行。7月26日,中国邮政发行《第三十三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纪念邮票一套2枚,邮票图案名称为“游泳”“攀岩”。全套邮票面值2.40元。邮票计划发行数量为626.9万套。

这套纪念邮票中的攀岩主题选择了女子速度攀岩的形象,画面采用斜侧视角,展现运动员抬腿踩点、向上攀拉的动作。游泳主题表现了男子自由泳的形象,画面采用从水中仰视的角度,展现运动员劈波斩浪、奋力向前的姿态。两枚邮票画面背景表现了埃菲尔铁塔等巴黎城市建筑,体现出本届奥运会的地域特色。

1980年2月13日,中国体育健儿首次参加在美国普莱西湖举办的第十三届冬季奥运会。同日,原邮电部发行《第十三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纪念邮票一套4枚。图案分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会徽”“速滑”“花样滑冰”“滑雪”。

1984年7月28日,原邮电部发行《第二十三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纪念邮票一套6枚,小型张1枚。这套邮票具有特别纪念意义。一是中国首次派出由353人组成的体育代表团参加在美国洛杉矶举办的第23届奥运会;二是奥运会的第一天,中国运动员许海峰在射击比赛中夺得第一块金牌。

2001年7月13日夜,北京获得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为庆祝这一历史性的时刻,中国邮政特别发行《北京申办2008奥运会成功纪念》邮票一套1枚,附票1枚,主票图案为北京申奥标志;附票图案为牡丹花。

2004年8月13日,中国与希腊邮政联合发行《奥运会从雅典到北京》纪念邮票一套2枚,两枚邮票图案选用分别代表希腊与中国的标志性古建筑为主图,并加上奥运“五环”标志,既突出了地域概念与奥运会的主题,又体现了绵延不息的奥运精神。

2008年8月8日,第二十九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北京举行。开幕式当天中国邮政发行《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纪念》邮票一套1枚。图案展现的是梦幻般、蓝渐变色上鸟瞰的国家体育场鸟巢中,飘逸出一幅浓缩的象征北京奥运开幕式舞台的山水画;同时还发行了《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项目》邮票小全张和《北京2008年奥林匹克博览会开幕纪念》邮票一套2枚,小型张1枚。在8月24日第29届奥运会闭幕当天,我国与英国联合发行《奥运会从北京到伦敦》纪念邮票一套4枚。图案分别为北京国家体育场、北京故宫角楼和伦敦眼、伦敦塔。

2015年7月31日,北京联合张家口成功获得2022年冬季奥运会举办权。中国邮政于当日发行《北京申办2022年冬奥会成功纪念》邮票一套1枚。2021年6月23日,中国邮政发行《北京2022年冬奥会——竞赛场馆》纪念邮票一套4枚,小型张1枚。邮票内容包括首钢大跳台、国家游泳中心、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小型张为国家速滑馆。该套邮票采用平面设计手法表现,画面构图饱满、色彩丰富,4枚邮票采用连票设计形式,以富有变化的曲线贯穿;小型张邮票则根据场馆的结构特点,采用椭圆形票幅展现,并在边饰中点缀雪花图形。

2022年2月4日,中国邮政发行《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纪念》纪念邮票一套2枚,邮票图案为共向未来、希望之光。邮票画面将冬奥会开幕式丰富、动感的视听语言转化为平面语言,呈现冬奥会开幕式的经典元素。(据《人民政协报》)

清代铜鎏金烛台



烛台高37.5厘米,通体为铜胎鎏金,双层蜡盘皆成海棠形,口沿雕回纹一周。烛台共5层,外壁镶嵌绿松石、珊瑚,颜色鲜艳,其间篆刻蕉叶纹与卷草纹,工艺极为精湛,显得富丽堂皇。据介绍,该烛台造型端庄大气,工艺精细规整,展现了清乾隆年间铜鎏金工艺的风貌特点。(据《侨乡科技报》)

太狮少狮镇平安



这方明代铜鎏金太狮少狮镇纸,高8.2厘米、长16.5厘米,重量超过1公斤,十分厚重。太狮作回首状,颇有傲视之姿,少狮伏在太狮背上,又融入了一丝亲情和慵懒,使得整体藏品更为和谐。它不仅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更是历史文化的见证者。我们在欣赏其美丽造型与精湛工艺的同时,也能够感受到古人的智慧和创造力,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据《收藏快报》)

黄金,这一有着与太阳一样光芒和色彩的奇妙物质,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它如同一条金色的纽带,跨越时空,串联起不同时代、不同文明的璀璨光芒。

“自古黄金贵,犹沽骏与才。”在中华文明史上,黄金同样占据着重要地位。自古以来,“金”一直是尊贵和权力的象征。中华文明在迈入国家文明形态的初期,便与黄金结下了不解之缘,数千年积淀下来的黄金历史与文化,至今仍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流金岁月——照耀中华文明前行的金光

在中华大地上,黄金的使用大致经历了起源探索期、初步发展期、成熟与统一期、鼎盛繁荣期和多元转型期。这一过程展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与创造力,实证了中华文明演进与融合中的多元一体,铸就了中华民族独特而辉煌的“金色传奇”。

据考古发掘,约4000年前,河南汤阴龙山文化时期的先民可能已将金砂与陶片巧妙融合,开始对黄金使用的探索。数百年后,甘肃玉门火烧沟四坝文化时期的先民凭借纯熟的工艺,制作出金耳环等饰品,让闪闪发光的黄金真正走进人们生活。

商代前期,黄金的光芒照亮黄河流域,陕西、河南、山西等地都留下金器的足迹。这个时期,黄金制品的种类已十分丰富,陕西渭南华州出土的月牙形金项饰,河南郑州商城出土的夔龙纹金叶,以及郑州商都书院街出土的金覆面、金泡等,无不展现着中华先民精湛的工艺和对美的追求。

商代中期,黄金的光芒辐射到长江流域。湖北黄陂盘龙城杨家湾出土的金饰片绿松石,以其独特的设计,讲述着黄金在南方大地上的崭新故事。及至殷墟时期,黄金的光芒照亮了更广阔的天地,殷都城及其周边的“山河四省”(山西、山东、河南和河北)以及成都平原,成为金器最为耀眼的聚集地。

这一时期,金器种类呈现出北、中、南地区的不同特点:北方各种耳环、臂钏、金泡等金器饰品,仿佛在歌颂生命的活力,诉说着人们对美的无尽追求;中原地区则以金箔、金叶、金片等器物装饰为主,闪耀着厚重文明的光辉;南方的成都平原,金面具、金杖、金冠带,以及虎形、鱼形等祭祀品,还有那些裹着金箔的祭祀物品,无不散发着神秘而庄重的气息,在彰显古蜀文明独特魅力的同时,也展现出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文化交流。北、中、南地区金器的丰富多样,宛如一曲和谐多彩的乐章,展现了商代文明的多元与统一。

西周时期,黄金的辉煌版图进一步扩展,照耀了甘肃、青海、内蒙古、辽宁、新疆等地。黄金的应用呈现出令人惊叹的多样性和创新性。北方地区,单一的身体装饰品时代悄然而去,金箔、金叶、金片、鎏金等器物纷纷登场,尤其是在西北地区,鎏金工艺大放异彩,铜戈、铜梳、铜针线筒、铜镜、金贝等兵器和生活用品的出现,闪烁着古人的智慧与巧思。北京琉璃河遗址出土的金饰漆觚,是文化交融的绝佳体现;山西晋侯墓地出土的成组大型金带饰,闪耀着权力与财富的光芒,诉说着“金玉其外”的贵族生活;山西翼城大河口霸国墓地出土的金柄形器、山东滕州市前掌大商周墓地出土的贴金箔当卢,显示墓主具有较高的身份和地位。

东周时期,工匠们的创造力如火山喷发,纯金、错金、鎏金、包金等工艺争奇斗艳。错金银的工艺更是将青铜器装饰推向顶峰,如战国中期的错金银虎噬鹿铜器座生动精美;陕西宝鸡益门出土的金柄蟠虺纹镶嵌绿松石铁剑,不仅是金与铁、玉的完美结合,更是东周黄金铸造工艺登峰造极之作。



汉代海昏侯墓出土的黄金。



甘肃玉门火烧沟遗址出土的金耳环。(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秦汉大一统时代,黄金的光芒照耀更广阔的疆域。这一时期,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成为金器流行的中心舞台。在工艺的演变上,错金、包金逐渐淡出,鎏金和纯金则占据主导地位。金丝、金粒巧妙配合,编织出令人目眩神迷的立体组合器,仿佛是工匠们用黄金谱写的视觉交响乐。从身体装饰到器物点缀,从神秘的随葬金灶到精巧的金银针,再到日常用具,金器类型丰富,几乎无所不包。海昏侯刘贺墓中出土的120多公斤金器,更是如同一座璀璨的金山,向世人炫耀着汉代的富庶与奢华。黄金还不断深入到边疆地区,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云南晋宁石寨山“滇王之印”的发现,佐证了西汉中央政权对边疆古滇国直接行使治权,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实证。



三星堆遗址3号祭祀坑出土的金面具。(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大唐盛世,强盛的经济、繁荣的文化、开放的政策,加之畅通的丝绸之路,让中华大地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黄金熔炉。锻造、焊接、抛光、镂空等技艺的精湛运用,让一件件金器蜕变成无与伦比的艺术珍品。从炊器到食器,从茶具到药具,从香囊到宝函,唐代金器的种类之丰富、用途之广泛,无不彰显着这个时代的繁华与品位。贵族们对金器的狂热追求,还推动了黄金工业的飞速发展,打破了皇室垄断的局面,形成官营和私营并存的繁荣景象。

宋元时期,和玉器一样,黄金这类过去高不可攀的物质,开始走向商品化、世俗化。这一时期金器具有典雅、自然、艺术风格,形体小巧,清秀雅致,胎体纤薄,纹饰淡雅,题材多源于社会生活,从而形成了与唐代雍容华贵迥异的时代风格。辽金的黄金制品则显示出浓厚的草原文化风格。

明代,黄金器物在承袭宋元古朴典雅风格的同时,也出现装饰华丽之器。而清代金器的器型和纹饰已经全无古朴之意,造型绚丽多姿,纹饰繁复,再配以各种宝石点缀,使得整个器物五光十色,富丽堂皇,表现出浓郁的宫廷奢华之风。

金声玉振——中华文明礼制表达的演变



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的“滇王之印”。(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与玉器在中华大地上拥有近万年的使用史不同,黄金是在国家文明形态形成后,从北方传入,发展至全国。随着王朝文明的发展,玉器、青铜器和黄金器物逐渐成为中华礼制文明的核心元素。这三种代表当时高科技成就的不同材质,不仅各自承担着礼器功能,还相互融合,形成青铜与玉、黄金与玉、青铜与黄金三种组合的“金玉文化”。这种融合发展,亦是中华文明包容性和创新性的体现。

在青铜器和黄金器物之前,作为“山川精灵”的玉,是中华先民处理人与自然、社会和人关系的重要载体。新石器时代晚期,良渚文化的玉璧、玉琮,大汶口文化的牙璋,龙山文化的玉钺等,都是礼仪文化中的重要器类。青铜技术与中华大地超万年的制陶技术相结合,则迅速完成了在地化,并在夏朝时形成以青铜容器、乐器、兵器为核心的礼制文明。与此同时,嵌绿松石兽面纹牌饰的出现,标志着“金”(青铜)玉文化”在礼制层面的首次融合。而此时,黄金仅作为身体装饰品进入中华大地,尚未与礼文化相关联。

商代中期,黄金开始融入中华礼制文明,如郑州商都书院街和湖北黄陂盘龙城出土了表达信仰的金饰镶嵌绿松石牌饰。商代晚期,黄金在中原和北方成为身份标识,三星堆先民则将其用于祭祀礼仪。两周时期,尽管黄金在礼制中地位提升,出现错金、鎏金青铜器,但当时



陕西咸阳县张湾出土的东罗马金币。(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宋代世俗化的金器,进入百姓日常生活礼仪之中,《梦粱录》卷二十“嫁娶”条记载:“且论聘礼,富家之人当备三金送之,则金钏、金戒指、金钗坠者是也。”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婚嫁习俗不断演变,但“三金”作为结婚礼俗的一部分,至今仍被许多地方视为重要的传统保留了下来。

在中华文明史上,金玉文化的长期积淀,故而积累了大量以“金玉”表达美好和愿望的词汇,如金玉满堂、金玉良言、金枝玉叶、玉箫金管、珠玉浑金、金章玉句等,这些至今仍浸润着中国人的文化生活。



内蒙古赤峰喀喇沁旗哈达沟窖藏出土的摩羯纹金花银提梁金。(内蒙古博物院藏)

炫彩金光——黄金对中华文化的丰富

历史上,黄金在中央政权处理与地方的关系、协调族群关系,维护中华民族政治一体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史记·西南夷列传》曾载:“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宠焉。”1956年,考古人员在云南晋宁石寨山墓葬中发现“滇王之印”金印,将这段史书记载照进了现实。无独有偶,“魏归义氏侯”“晋归义氏王”“晋归义羌王”“晋归义胡王”“蛮夷侯印”等金印的出土,体现了各族群对中央政权价值及政治认同。清朝在西藏地区创造性地施行“金瓶掣签”制度,解决了藏传佛教的传承和延续问题,也增强了中央政府的权威。这些金印、金瓶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政治策略的完美展现,也是中华文明统一性和包容性的具体实践。

黄金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金色纽带。中华文明是一个极具开放性、包容性和创新性的区域文明,与世界其他地区文明特别是亚欧大陆西侧的早期文明有着广泛而深刻的联系,黄金艺术就是非常生动的表达。

从目前的发现来看,黄金约在五六千年前的地中海和近东地区开始被人们所使用,后来不断向东扩散,遍布欧亚大陆。中华先民虽然在约4000年前开始探索使用黄金,但并没有形成稳定的利用模式。以甘肃玉门火烧沟四坝文化为代表的一批成熟金器的使用,应是受到欧亚草原文化东传南下的影响。珠化工艺、喇叭形耳环、新月形配饰、东罗马货币、虎纹金金牌、雪豹纹金箔、狮形金箔、对虎纹金箔饰带、双联金牛头剑首等深受西亚、中亚文化影响的工艺、形制、纹样,

极大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多样性。

丝绸之路的开通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大规模交流,尤其在汉唐时期,黄金艺术展现出显著的交流、融合和创新特征。唐代出现了大量具有异域风格的金器,如鎏金银壶、金杯和各种金杯等。

文化交流是双向的,中国传统纹样如团花和缠枝花也出现在近东和中亚的文化中。宋代“南海一号”沉船中发现的镶嵌黄金首饰,更是展示了一种早期的“供应链”模式。这些黄金饰品以成品或半成品的形式,运往阿拉伯半岛或波斯湾地区进行使用或再加工。这些现象充分体现了黄金艺术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展现了中华文化的丰富内涵,以及其与世界文化交融的过程。

黄金不啻自高贵,熠熠生辉千百年。今天,我们来看人类文明和中华文明的演进,黄金的利用史无疑是一条耀眼的线索。它精彩的身影,纵贯上下五千年,横跨欧亚大陆,传之不朽,且依然光彩照人。(据《中国民族报》)



陕西宝鸡益门2号墓出土的金柄蟠虺纹镶嵌绿松石铁剑。(宝鸡市考古研究所藏)